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郑吉雄 著

易图象与易诠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郑吉雄 著

易图象与易诠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图象与易诠释/郑吉雄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18-5

I. 易… II. 郑… III. 周易-文集 IV. B22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069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易图象与易诠释》,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25 号

易图象与易诠释

著 者 郑吉雄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倪佳佳
责任校对 陆海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18-5/B·364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社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序

我自2000年1月1日参与“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负责执行分项计划“中国近世儒者对《易经》的诠释”，至今刚好满两年。这部书是这两年来我在此一课题上研究成果的一个结集。

《周易》图书之学，与义理、象数并列为《易》学的三大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易》图之学从思想史上讲，涉及“儒道之辨”的问题。传统学者对于此一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有的认为儒道之间可以交融，也有的认为儒道之际必须区隔。其实当代的学者已不需要在这两种态度中做选择。一种思想或一种观念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性质和价值，也就是有其不可以任意与他种思想、观念混合的理由。然而，思想观念永远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者本着自由的意志，无论是着眼区分思想观念的不同处，或者纵心消解彼此特性的差异点，都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轻率地给予是非、优劣之类的评价。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出“儒道之辨”，主要是表达个人对于儒家、道教思想特性的尊重，以及对于二派思想在历史上彼此互相影响的重视，而不是企图提出“辟佛老”一类的议题。

《易》图之学从学术史上讲，涉及汉学、宋学异同的问题。这门学问肇兴于北宋，为理学家普遍接纳。《先天图》与《太极图》尤为宋学的重要内容。两宋图书之学多属形上玄思，与汉学重视文献实证大异其趣。清初学者抨击《易》图，多激烈之语，与其时代背景及治学方法、信仰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异同，并非仅仅为旧问题而已，它还牵涉到学术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如何可以贴近真理的问题。

《易》图之学从《易》学史上讲，是以一种异于汉代象数的象数理论为基础的学问，建构的则又是一套异于王弼(226—249)、程颐(1033—1107)义理之学的义理。汉代象数如卦气、纳甲、辟卦等理论，在宋《易》图书一门中颇被继承发扬。但宋《易》图之学，对于形上之理的演绎，如邵雍关于“天根月窟”^①的深微阐释，的确已超出汉儒以元气为主体的象数体系；而同时又与王弼以明象为主^②、程颐以崇理为主^③的义理思想，大不相同。这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易》图之学从儒学史上讲，如前所述，其关系宋代理学形上思想至深；从较宽泛的角度看，更可发现宋代《易》图大盛以后，又衍生出许多表述儒学思想的各种图象论著。若将这些论著的内容和方法结合起来观察，未来或许可以建构以《易》学和儒学二者为中心的图象诠释学。本书《论儒道〈易〉图的类型与变异》一文，对此有较多而且较集中的讨论。

我自接触《易》图这门学问至今，已有十余年光景，最初于1987年发表《论宋代〈易〉图之学及其后的发展》^④。该文以分析材料为基础，但关心的是思想史的问题。文章虽曾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研究奖励，但14年后的今天重新检视，觉得不圆满的地方太多，而且其中若干重要的观点，在这两年来的撰述中均已重新思考检讨，因此这次辑集成书，该文并未收入。以下我将

① 邵雍(1011—1077)有诗“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黄宗羲(1610—1695)引述朱熹(1130—1200)的解释，“天根月窟”就是指“复”、“姤”二卦。雄按：朱熹的意思，应该是指“复”“姤”二卦将要但尚未完全形成的一刹那。“乾遇巽”，初九变为初六，阴始息而阳始消；“地逢雷”就是“坤逢震”，初六变为初九，阳始息而阴始消。阳消阴息、将变未变之机，即为“月窟”；阴消阳息、将变未变之机，即为“天根”。故黄宗羲解释：“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间为天根，以其为一阳所生之处也；指乾、巽二卦之间为月窟，以其为一阴所生之处也。”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重点就在“之间”两个字。参《易学象数论·天根月窟》，收入《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9册，页20。

② 王弼《周易略例》有《明象》篇。

③ 《二程遗书》卷二十上记伊川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213。又《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④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创刊号(1987年)，页1—38。

本书所收录的5篇文章,依次分述其写作背景与论旨。

第一篇《从经典诠释传统论二十世纪〈易〉诠释的分期与类型》宣读于2000年6月的总计划第一次研讨会^①,为总计划首场研讨会3篇背景论文之一。在这以前,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已经刊行,不过我的文章重点在于“经典诠释传统”此一主线,从这条主线切入讲20世纪《易》诠释分期以及诠释策略区分的问题,与杨著颇不相同。又因这篇文章涵括的范围较大,因此置于全书之首。

第二篇《〈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发表得最早,系于1999年6月台大中文系与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合办“周易左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的论文。14年前我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易》图的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儒道之辨”的命题,莫立了这两年研究的一个大方向。该文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7期^②后,旋应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之邀,转载于《周易研究》第46期^③。

第三篇《论儒道〈易〉图的类型与变异》发表于2000年11月总计划第二次研讨会^④。这是分项计划第一年的重点论文。在撰写的过程中,我与研究助理从《正统道藏》、《藏外道书》和其他儒家文献所载录的数千幅图表中,全面地加以过滤,最后选择了498幅图,作为研究的基础。研究的重点,则是从诠释策略的角度,观察《易》图之学中儒、道两种论述的差异性。文章也讨论了刘宗周《人谱》和颜元《存性编》的许多幅图,尝试将这些图形和整个《易》图传统连系在一起,探索其思想史的意义。

第四篇《周敦颐〈太极图〉及其相关诠释问题》发表于2001年9月总计划第八次研讨会。《易》图之中,以周敦颐《太极图》和邵雍《先天图》最受重视,因其与宋代理学形上思想建构关涉最深的缘故。近数十年来,东亚学术界研究《太极图》的学者颇不少,对于周敦颐归属于儒门抑或道教,有不同的

① 该文已发表于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20、21期合刊(2001年),页175-242。

② 该文获得2000年度台湾科学委员会研究成果奖励(甲种)。

③ 即2000年第4期,页58-75。2000年11月。

④ 该文原题为《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论儒道〈易〉图的类型与变异》,并发表于《人文学报》,第24期(2001年)。

看法。我撰写这篇文章,最初的动机,是要对于历来学者引述该图时,往往不注意图形细部结构的缺失,提出针砭。但动笔以后,感于该图涉及思想史上儒、道异同的问题,兹事体大。于是深观冥索,综揽古今学者的论据,并透过图形的比较以及观念的分析,撰写成文,冀能全面地解决相关的争端。宣读论文当日,承与会的多位学者前辈给予赐正,我也据以修订全文。因篇幅太长,本书又出版在即,因此本文并未在学术期刊发表;但为了谨慎,我特别将影本送请杨儒宾教授审阅。承儒宾兄不弃,来函赐教,谨将该函载录于文章之末,俾供读者参酌。

第五篇《高邮王氏父子对〈周易〉的诠释》是提交2001年5月中研院文哲所举办“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清代学术思想和《周易》一直是我十余年来读书治学的重心所在。2000年夏天我在文哲所担任短期访问学人时,曾完成一个关于王念孙《读书杂志》的研究计划并撰成论文^①,始稍窥高邮王氏父子的治学门径。未几,决定藉由探研《经义述闻》的论《易》方法,来说明清儒治经态度的一面。文章也举出实例,证明经传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20世纪初以来《易》学界“经传分离”的观点,必须修正。至于传统学者以象数论《易》,其是否有效,端视他们如何定义“象”与“数”,对象数的运用又推衍到什么程度。象数相关的课题十分繁复,依从印象,或单凭耳食,都是无法获得正确结论的。在这个领域中,未来可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

以上5篇文章,《〈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附图10幅,《论儒道〈易〉图的类型与变异》附图108幅,《周敦颐〈太极图〉及其相关诠释问题》附图54幅。若随文附列,颇多不便,谨辑录于各篇篇末,以供参考。

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看,20世纪西方世界的诠释学家都普遍注意到诠释者和文本(text)之间的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观察,诠释者在论解文本时,当然不可能单纯地透过分析文字来还原作者的原意。囿限于特定客观环境

^① 该文题为《乾嘉治经方法中的思想史线索——从治经方法到治先秦诸子》,其后于2000年12月16日宣读于中研院文哲所“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第四次研讨会”。该文亦将收入该会议论文集。

的“人”，永远只能透过一个围困着他的时空，来观察另一个时空的文本^①。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当代诠释学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即在于诠释活动中“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与互动。

我的看法是：历史兴替，生生不息，晚出的研究者，自有其不可改变的劣势。原因在于：尽管古往今来每个人都不免囿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但只有生于后世的诠释者，才能够站在异于经典作者（第一立场）和后来的诠释者（第二立场）的另一个立场，较为全面地观察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诠释活动，一窥思想史的变迁转移及其精微奥义。当然，他也终会无法避免地将个人的思想理念（第三立场）灌注到经典中，而纵浪于诠释传统的大流。但我始终相信，作为学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生于后世的我们，在某一意义上是可以超越古人的：我们之所以能超越，是因为我们可以解释旧文献^②，赋予他们新的意义，而旧文献却不能解释我们。然而，也正因如此，当面对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经典和古人时，我们更要从心底付出真诚的谦卑。

我于18年前承黄沛荣老师引领入门，始窥《易》学《易》理；十余年来，蒙何佑森老师悉心指导，渐识清代学术。自执行计划以来，又得黄俊杰老师鞭策激励，累积文稿愈多。加上诤友惕励，内子协助，此书始得面世。编辑期间，陈琪薇、傅莉雯、曾宣静、沈凡玉、徐淳琰等几位同学出力甚多；最后内子敏慧为全书校读订讹，备极辛劳，于此一并致谢。

2002年1月3日凌晨郑吉雄识于台北寓庐

① 如舒拉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认为诠释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时空差距，是推动诠释者去了解文本的作者；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思想则被称为 existential-ontological hermeneutics，海德格所谓 existential 即强调人的存在环境所给予的一种局限，亦即说人只能在所存在的位置观察外在的世界，并赋予意义。（以上参考 Josef Bleicher,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p. 98 - 153.）总的来说，我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诠释传统和西方的诠释传统最大的差异，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诠释对象偏重以“经典”文本(text)为主，而西方诠释学者则更多注意诠释者的诠释活动。关于这一点牵涉甚广，我拟另文处理。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文，典籍也；献，贤者。”

<h1>目 录</h1>	
序.....	1
从经典诠释传统论二十世纪《易》诠释的分期与类型	1
一、前言	1
二、二十世纪《易》学的突破	3
三、学术界对百年《易》学派别与分期的看法	8
四、百年《易》学发展的三个时期	17
五、近代学者诠释《周易》的三种类型	28
六、结论	50
《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	52
一、前言	52
二、《易图明辨》的写作背景	54
三、《易图明辨》的整体方法	61
四、《易图明辨》的三个分判	65
五、儒道之辨的三个历程	73
六、结论	80
附图.....	82
论儒道《易》图的类型与变异	84
一、前言	84
二、问题的提出	86

三、“图”——非文字的诠释工具	91
四、图的变异:以《太极图》首圈为例	96
五、《易》图的四种类型	106
六、图象思维与经典诠释	132
七、结论	135
附图	137
周敦颐《太极图》及其相关诠释问题	163
一、前言	163
二、古今《太极图》图形的歧异	164
三、《太极图》问题的焦点	175
四、朱熹的诠解与儒道思想的转移	182
五、《太极图》思想归属的四种观点	200
六、结论	204
附:杨儒宾教授函	207
附图	208
高邮王氏父子对《周易》的诠释	222
一、前言	222
二、以爻位训释爻辞、爻象	223
三、以本卦自释,复以六十四卦互释	231
四、以诸经、诸子训释《易经》	235
五、发明本经义例	238
六、追求全经义例一贯的观念	245
七、余论:方法论的检讨及关于吴皖分派的问题	249
八、结论	256
人物生卒年及索引	258
名词索引	267
主要参考书目	271

从经典诠释传统论二十世纪 《易》诠释的分期与类型

一、前 言

中国传统儒者研究和诠释《周易》，大致分为义理、象数、图书三个方向，形成三个不同的体系^①。19世纪以降，中国受到内忧外患的刺激，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激烈的变化。论者或认为，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个传统架构，几为全盘崩溃而后重新组合。在这里我暂不欲以此一观点来坐实学术界对于《周易》的诠释与研究，亦完全合乎“崩溃→重组”此一轨迹方向；但百年来学者释《易》，的确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讨论的范围，是以20世纪为限。就20世纪的《易》学作全盘介绍，

① 屈万里先生《先秦汉魏易例述评·自序》说：“历代《周易》之学，凡经数变：上下经文，初止用于占筮。十翼而后，乃借以阐发哲理。至西汉中叶，孟喜习灾异之术，好以象数说《易》；东汉《易》家，推衍其说，至三国而极。王弼奋起，扫象数之穿凿，复于十翼之平实，历六朝隋唐，定于一尊。下逮赵宋，‘河图洛书’、先天后天之说兴，而《易》学再变，以迄晚明。迨清考据之学，突越前代，复排河洛先后天之谬，而反于汉人之象数。至于今兹，余风未泯。惟例变虽多，然综其大别，则不过象数义理图书三者而已。”（台北：学生书局，1969。页1）屈先生这段文字对《易》学发展历史演变的观点，是属于本世纪三个《易》学论述中的一种论述。但基本上传统《易》学分为象数、义理和图书等三个领域，形成三个不同的体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易》学只有“义理”与“象数”两途，这是因为他们将“图书”纳入“象数”之中。我的看法认为，图书学说固然主要建基于象数，但事实上宋儒图书之学的象数与汉儒的象数两者即颇不相同，而汉儒的象数之学与宋儒的图书之学彼此不能互相涵括，分列应该较为清楚。

目前最新的专书可能是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一书^①。而早在1961年已有高明《五十年来之易学》^②一文，著录作者52人，作品92部。继而有徐芹庭在《六十年来之国学》^③一书中所撰《六十年来之易学》一文，著录作者53人，作品47部35篇，另“丛书或专集所列之易学”计作者94人，作品72部288篇。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和另一部1988—1992，著录81年间《易》学论著。1912—1987共75年间的《易》学论著，含专著、论文及学术期刊，计2536种。1988—1992共4年间的《易》学论著，计1986种。依此推算，至本年底亦即20世纪最末一年为止^④，中国学术界的《易》学论著，粗估约有七千种左右。

据《经学研究论著目录》的分类，百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易》学研究的课题的确十分多。但总的来说，可以概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偏重文献而以《周易》经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第二类是研究《易》学理论体系及其相关问题的；第三类是研究《易》学史，包括历代各家各派《易》学理论的。当然这三类《周易》研究彼此之间密切相关，并非可以截然划分。因为本文是站在“经典诠释”的角度撰写，因此必然将焦点较集中在第一类的论著。

本文是为2000年6月1日“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学术研讨会撰写的3篇“背景论文”之一，主要是就本世纪《易》诠释的整体背景，作鸟瞰式的描述。限于篇幅，若干随文提及的重大问题暂未能作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工作，只能留待未来以专文方式再作讨论。另一方面，下文会论及徐芹庭、杨庆中、廖名春等关于20世纪《易》学的著作，凡他们著作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本文尽量不予以重复论述，但与本文题旨有关涉者亦必尽量提及。另外，相关《易》学课题的著作情况，《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均已极为详尽地著录。本文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亦将不会以罗列著作名称为务。

① 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据徐氏称该文为“1961年张晓峰先生刊于中国一周”。参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2），第1册，页16。

③ 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同前注。

④ 承林庆彰教授见告，《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93—1997的部分已经完竣，即将付梓。

二、二十世纪《易》学的突破

(一)《周易》诠释传统架构

从经典形成的角度观察,《易传》(包括传本的《十翼》以及随着帛书《周易》出土的《要》、《昭力》等篇,以及其他可能存在过的释《易》作品)系从《易经》而来;《易经》之中,卦爻辞是解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六十四卦又系自八卦重叠而来;八卦系自阴阳爻叠合而成。合三爻而成一经卦,八卦重而为六十四卦,合卦爻辞而成“易”(即后世之《易经》),《十翼》出而有《易传》,秦汉以降,二千余年学者以《周易》经传为中心,诠释推衍,使《周易》相关著述汗牛充栋,《易》学蔚为大观。李申在《发挥派与本义派——易学方法论两派述评》一文中说:

《易传》是对《易经》的发挥。《易经》之中,辞是对卦爻的解释,而卦爻本来是无辞的。卦象之中,六十四卦又是八卦的发展。再往前推,起初可仅有阴阳二爻以定吉凶而已。因此,一部《周易》,乃是由二爻、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传依次发展的金字塔形结构。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源头,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的发展、发挥。好像从一个山泉中流出的水,起初只是涓涓细流,后来汇进了支流和雨水,成为一条浩荡奔流的江河。《周易》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发挥的产物。因此,从八卦的创造开始,《周易》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发挥派。^①

李申对于《周易》一书如何形成的观点讲得很清楚。他的所谓“发挥”,所强调的是《周易》如何由阴阳二爻为起始点,发展而为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再而至于《十翼》。其内在关系,是在于晚出的部分(如卦爻辞)一定是不断

^① 李申:《发挥派与本义派——易学方法论两派述评》,刊《哲学研究》,第1期(1992年)。

扣紧着早出部分(如卦爻)的中心意旨,同时又发挥出新的意义。他认为“本义派”其实也就是“发挥派”——所有研究《周易》的学者,都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求取本义。

其实不独《周易》如此,诸经恐怕亦无不如此。《五经》本身处于经部文献的核心,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历代注经者多掌握原始经文文本中某一字、一词或一观念,虽然一方面不忘字词的本义,但也同时不断灌注入自身的思想观念。如此演绎下去,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创发出数不清的新思维和新意义。李申说“《周易》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发挥派”,其实《五经》的每一位作者和注释者,都可以说是发挥派、演绎家^①。

上文论述《易传》对《易经》的发挥,主要看出,卦爻辞是整个《易》学世界的核心。《易传》作者踏出了第一步,从核心观念往外发挥出去,但又紧紧地向核心的意义靠拢。《易传》以后,诠释演绎《周易》的学者,大体上亦遵循此一方向发挥撰述。我们试将《周易》的诠释传统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即可明了。

就著述的种类而论,中国三千年经学的著作,第一类是经书(即《五经》),第二类是直接诠释经书的著作(包括两类,一类为《公羊》、《尔雅》之类,初为释经著作,后则入于“经”的行列,与《诗》、《书》并列;另一类则为《毛传》、《尚书大传》等未列入《十三经》却同为直接释经的著作),第三类是注释第二类释经著作的著作(如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郑玄(127—200)《毛诗笺》之类),第四类是疏释第三类释经著作的著作(如徐彦为何休(129—182)《春秋公羊传解诂》作《疏》、孔颖达(574—648)为郑玄《毛诗笺》作《正义》之类)。每类释经著作的时代都较前一类为晚,后一类解释前一类,形成了一种尊崇古昔、依随传统的型态。这四类著作,每一类就是一层:第一类为核心;第二类为第一层,包围着核心;第三类为第二层,包围着第一层,如此类推。

上述经学诠释的型态,至南北朝而大备。《隋书·经籍志》载录汉魏经

^① 关于儒家“经”的本义,可参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编著:《经学通论》(台北,空中大学,1996),第一篇“绪论”,第一章“经与经学”,页3—13。相关论文则可参华仲馨:《六经讨源与孔子述作》,《孔孟月刊》,第7卷第9期(1969年),页4—5。

注非常多,当时学者比较少直接注解《五经》,而以“尊古”的态度,解释或补充汉代旧传旧注的则较多^①。据李延寿《北史·儒林传》,魏晋以来经学,至隋统一而北学并于南学^②。据《隋书·儒林传》,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至炀帝复学,“旧儒多已凋亡”,隋唐之际,“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③。

自唐人纂修《五经正义》,采集汉魏以来注疏的某一种加以传述疏释,“《易》用辅嗣而废康成,《书》去马、郑而信《伪孔》,《谷梁》退麋氏而进范宁(339—401),《论语》则专主平叔”^④,经传注疏的形体定于一尊,这一传统发挥至极致^⑤;但定于一尊也产生了举一废百的副作用,造成了许多汉魏经说的失传,也为后儒所诟病。另一方面,唐代《五经正义》的编集,已标识了前述四类经学著述总合起来的一种成熟的型态。

北宋以降,儒者跳脱《正义》及汉魏旧经旧注的矩矱,做了大量疑经改经的工作。就本文所提出“四类著作”的观念看来,宋儒舍弃《正义》甚至汉儒传注,直接“以意逆志”,重新注解经典,启导新的风气,突破了尊信旧传旧注的老传统。如程颐《易传》不用王(弼)、韩(康伯)注^⑥,朱熹《诗集传》不诠释《毛传》、《郑笺》等。他们表现出一种不甘心于做第五类或取代第四类经学著述工作的态度,而希望占据着“第二类”(或至少具有与汉儒经注平等的地位)的位阶。宋儒直接攻取先秦经典,为经文作出新的注解,无论其为疑经抑或改经,始终对《五经》这个核心维持高度尊崇,而儒学竟亦因得转化,创立新的局面。

① 举《诗经》为例,“《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因此《隋志》载录《诗经》书目,“亡书合七十六部”,存者 39 部,《韩诗》著述只 3 种,其余 36 种均为《毛诗》。36 种中,包括后魏太常卿刘芳(453—513)撰《毛诗笺音证》十卷、晋给事郎杨义撰《毛诗辨异》三卷、乌程令吴郡陆玕撰《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等等,不一而足,而绝无跳脱《毛诗》或三家《诗》而直接疏释《诗经》的作品。

② 《北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八十一,第 4 册,页 2707。

③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七十五,第 6 册,页 1706—1707。

④ 江藩(1761—1831):《汉学师承记·序》(香港:商务印书馆,1964),页 11。

⑤ 如孔颖达修《毛诗正义》、《尚书正义》,采《毛传》、《郑笺》、《伪孔传》为本,而以刘焯(544—610)、刘炫(546—613)的底本为《正义》之类。

⑥ 《伊川易传》亦将各爻的象辞分系在该爻之下,所据的亦是王弼的本子。